

钱穆作品系列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钱穆作品系列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3 / 钱穆著.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钱穆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3215-7

I. 中… II. 钱…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436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8—3069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6.875

字 数 136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 序

本书第二编第一册所收,起自西汉,迄于南北朝,凡得散篇论文共十二篇。其有关两汉经学者,大多收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其有关魏晋清谈,自王弼何晏以下诸家,有一部分收入《庄老通辨》。此编皆不复载。作者复有《秦汉史》,《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国史大纲》诸种,与此编有关涉,皆可参读。

一九七七年初春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八十有三。

# 目 录

序 1

读陆贾《新语》 1

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 6

司马迁生年考 16

太史公考释 22

刘向《列女传》中所见之中国道德精神 35

东汉经学略论 47

略述刘邵《人物志》 56

葛洪年谱 64

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 71

袁宏政论与史学 80

读《文选》 101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140

## 读陆贾《新语》

陆贾楚人，《新语》文体，上承荀卿，下开淮南，颇尚辞藻。荀屈同为赋宗，盖荀卿曾南游楚，而染其文风耳。《庄子·外篇》如《天道》《天运》，亦近此体。贾谊以下至董仲舒，为北方文体。西汉文章，至贾董而始变。

《新语·道基》篇开首，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此即《中庸》所谓赞化育，参天地也。下文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一节，极似《易大传》。然则《易大传》殆先《新语》，成于秦儒，会通儒道，亦楚风也。据是疑开首传曰，亦指《易传》。惟今《易传》无其文。岂《易传》自《新语》后，尚续有增删，始成今之定本乎？

《术事》篇开端，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此等亦极近《中庸》，皆自荀卿法后王之论来。其过激则为韩非。司马迁《六国年表序》亦承此旨。而贾董则近法先王，此亦晚周至汉初学术界一分野也。

《术事》篇又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书孔子为仲尼，其风亦

盛于晚周,如《中庸》《孝经》皆其证。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虽亦偶有其例,要之至晚周始成风习。汉儒率多称孔子,此亦证《新语》当属汉初。

《辅政》篇《无为》篇皆参杂以《老子》之说。《老子》书起于晚周,《易传》《中庸》皆承儒义而参以道家言,《新语》亦尔,此乃当时学术大趋也。

《无为》篇云:君子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又曰:渐渍于道德,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道德连用本《老子》,中和连用本《中庸》,尚宽之说亦本《中庸》,《语》《孟》以至《易·系传》皆言刚,不尚宽。

《辩惑》篇记孔子夹谷之会,辞语与《穀梁》大相近,然则《穀梁》亦远起先秦矣。虽至汉中叶后递有增润,始成今本,不可谓其绝无师承也。

《慎微》篇亦会通《老子》《中庸》以陈义。其曰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以道德合之于权势,不仅《老子》有此义,即《中庸》亦有之。孟子言孝,举舜,而《中庸》言孝必据周公。舜之孝行尚在草莽,周公则正籍权势以大显其道德者。篇末引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此亦证《孝经》远起汉前。

《辩惑》篇又云: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实,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又曰: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忧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来。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又曰:隐之则为

道，布之则为文。其所描述，知其时实多人深山求神仙之事，与当孔子时沮溺荷蓁之徒，大异其趣。《庄子》寓言，始有此等意想，殆自晚周而始盛。秦皇海上方士虽无验，然楚汉之际，天下大乱，此等风气仍持续，即张子房亦解谷欲从赤松子游。然就《新语》以避世与隐居分别，则儒道合流，并不包括神仙在内。隐之为道，布之为文，显属有道家义。

《资质》篇深叹质美才良者伏隐而不能通达，不为世用，是乃惜隐，非高隐也。此显是会通儒道义而有此。

《至德》篇屡引《春秋》事，是必三传多有行于时者。篇末故春秋穀三字下有缺文，是殆引《春秋·穀梁传》也。

《怀虑》篇云：据土子民，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此《大学》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厥后董仲舒亦言，明明求仁义，如恐不及者，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如恐不及者，小人之事。此皆封建采邑之制既坏，贵族崩溃，工商生产事业新兴以后，为晚周以迄汉中叶一种共有之思想也。

《怀虑》篇又云：世人不学《诗》《书》，行仁义圣人之道，极经艺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听之者若神，视之者如异，然犹不可以济于厄而度其身，或触罪○法，不免于辜戮。此一节，可见当时智识界一种流行风气，殆是混合阴阳五行灾异变怪之说于纵横捭阖权谋术数之用，蒯通自称与安期生游，即此流也。此后淮南宾客亦多此类。至董仲舒言灾异，乃以会通之于

经术,此乃中央政权大定之后,与汉初拨乱之世不同矣。至以经艺连文,则称六经为六艺,已始于其时矣。

《怀虑》篇又云:战士不耕,朝士不商,前一语与韩非耕战之议异,下一语开汉制仕宦者不得经商之先声。

《本行》篇盛倡儒道,然其语多近《荀子》与《大学》,并旁采《老子》,亦征其语实出汉初,与武帝时人意想不同。

《本行》篇又云: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观下一语,知孔子定六经,其说远有所自。殆起荀卿以下,或出秦博士,而贾承其说。观上一语,则儒道阴阳合流之迹已显。

《明诚》篇有云: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此义远承《荀子·天论》。

《明诚》篇又云: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贤君智则知随变而改,缘类而试。此一节与仲舒以下言阴阳灾变者无大异趣,然与上引《怀虑》篇所云有不同。盖虽兼采阴阳家言,而固以儒术为主,此乃汉代儒术所以与方术纵横之士之有其不同所在也。

《明诚》篇又曰:圣人察物,无所遗失。○○鹄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至于鴈鹄来,冬多麋,言鸟兽之类○○也。十有二月李梅实,十月殒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气失其节也。鸟兽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纲之以法,纪之以数,而况于人乎。可知自董仲舒治《春秋》,通之阴阳,下迄刘向治《穀梁》而志五行,其风远自汉初,有其端绪矣。

《思务》篇有云：八宿并列，各有所主，万端异路，千法异形。圣人因其势而调之，使小大不得相○，方圆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纪之以节。星不昼见，日不夜照。雷不冬发，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则阴不侵阳。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气苞日，彗星扬光。虹蜺冬见，蛰虫夏藏。荧惑乱宿，众星失行。圣人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此等语即陈平所谓宰相之职在助天子理阴阳之旨也。陈平陆贾同时，宜其所言之相通矣。

丁酉岁暮，赴台北讲学，行篋匆匆，仅携陆贾《新语》一册。旅邸客散，偶加披玩，漫志所得。“怀虑”以下，则返港后新春所补成。戊戌人日钱穆识。

此稿成于一九五八年，刊载于一九六九年  
三月《大陆杂志》三十八卷五期。

# 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

## ——中国名人小传试作之一

中国民族，是一个具有悠长历史的民族。论中国文化之贡献，史学成就，可算最伟大，最超越，为世界其他民族所不逮。孔子是中国大圣，同时亦是中国第一个史学家，他距今已在二千五百年之前。西汉司马迁，可说是中国古代第二个伟大的史学家，距今亦快到二千一百年。孔子《春秋》和司马迁《史记》，同是中国古代私人著史最伟大的书。

远在西周，中国人早懂得历史记载之重要，常由政府特置史官来专管这工作。那些史官是专业的，同时也是世袭的。司马氏一家，世代相承，便当着史官的职位，联绵不辍。到迁父亲司马谈，是西汉的太史令，正值武帝时。在春秋时，司马氏一家，由周迁晋，又分散到卫与赵。另一支由晋转到秦，住居今陕西韩城县附近之龙门。迁便属这一支，他诞生在龙门。

当时的史官，属于九卿之太常。太常掌宗庙祭祀，这是一宗教性的官。史官附属于太常，这是中国古代学术隶属于宗教之

下的遗蜕可寻之一例。因此史官必然要熟习天文与历法。同时司马谈并研究《易经》与道家言。因这两派学说在当时,都和研究天文发生了连带的关系。

司马谈是一位博涉的学者,他有一篇有名的《论六家要指》,保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见司马谈博通战国以来各学派,不是一位偏狭的历史家。他的思想态度偏倾于道家,但他究是一位史学传统家庭中的人,因此他依然注重古典籍与旧文献,不像一般道家不看重历史。

司马迁出生在景帝时,那时汉初一辈老儒,像叔孙通、伏胜、陆贾、张苍、贾谊、晁错诸人都死了。汉文帝本好刑名家言。他的政治作风亦偏近于黄老。他夫人窦氏,更是黄老的信徒。景帝尤不喜儒家言。时有博士辕固生,因议论儒道两家长短,得罪了窦太后,命他下虎圈刺豕。这很像西方罗马的习俗。

但司马迁十岁时,他父亲便教他学古文字,治古经籍。因此他的学问,不致囿限在战国以下新兴百家言的圈套中。他将来综贯古今,融会新旧,成为一理想的高标准的史学家,在他幼年期的教育中,已奠定了基础。这一层,在《史记》里,他屡次郑重地提及。

他幼年的家庭生活,还保持着半耕半牧古代中国北方醇朴的乡村味。他二十岁开始作远游。《自序》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一次游历呀！中国到汉时，文化绵延，已达两三千年了。全中国的地面上，到处都染上了先民故事的传说和遗迹。到那时，中国民族已和他们的自然天地深深地融凝为一了。西北一角，周汉故都，是司马迁家乡。这一次，他从西北远游到东南，沿着长江下游，经过太湖鄱阳洞庭三水库，逾淮历济，再溯黄河回西去。这竟是读了一大部活历史。远的如虞舜大禹的传说，近的如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种种具体遗存的业绩，他都亲身接触了。这在一青年天才的心里，必然会留下许多甚深甚大的刺激和影响，是不言可知了。

这一次回去，他当了汉廷一侍卫，当时官名称郎中。照汉制，当时高级官吏，例得推荐他们子弟，进皇宫充侍卫。他父亲的官阶，还不够享受此殊荣。但武帝是极爱文学与天才的，想来那位刚过三十年龄的汉武帝，早听到这一位刚过二十年龄的充满着天才的有希望的新进青年的名字了。我们可想象，司马迁一进入宫廷，必然会蒙受到武帝的赏识。

在当时，他大概开始认识了孔子十三代后人孔安国。安国也在皇宫为侍中，安国的哥哥孔臧，是当时的太常卿，又是司马谈的亲上司。司马迁因此得从安国那里见到了孔家所独传的历史宝典《古文尚书》了。他将来作《史记》，关于古代方面，根据《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重要的史料，有许多在当时为一般学者所不晓的古文学新说。

大概他在同时前后，又认识了当时最卓越的经学大儒董仲舒。仲舒是一位博通五经的经学大师，尤其对孔子《春秋》，他根据公羊家言，有一套精深博大的阐述。将来司马迁的史学及

其创作《史记》的精神和义法，据他自述，是获之于仲舒之启示。

他当皇宫侍卫十多年，大概是他学问的成立期。后来有一年，他奉朝廷使命，深入中国的西南角。《自序》说：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这一段行程，从四川岷江直到今云南西部大理，即当时的昆明。大概和将来诸葛孔明南征，走着相同的道路。这又补读了活的中国史之另一面。但不幸，他这一次回来，遭逢着家庭惨变。

当时汉武帝正向东方巡狩，登泰山，行封禅礼。这是中国古史上传说皇帝统治太平祭祀天地的一番大典礼。但武帝惑于方士言，希望由封禅获得登天成神仙，因此当时一辈考究古礼来定封禅仪式的儒生们，武帝嫌其不与方士意见相洽而全体排槟了。司马谈是倾向道家的，但他并不喜欢晚周以来附会道家妄言长生不死的方士。因此他在讨论封禅仪式时，态度接近于儒生。照例，他是太史令，封禅大祭典，在职掌上，他必该参预的。但武帝也把他遗弃了。留在洛阳，不许他随队去东方。司马谈一气病倒了。他儿子奉使归来，在病榻边拜见他父亲。

《自序》说：

奉使西征，……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其父，下同），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

接着是他父亲的一番遗命,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后世中衰,绝于余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泪,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看了这一段叙述,可想司马谈是一位忠诚鲠直而极负气愤的人。他很想跟随皇帝去泰山,但不肯阿从皇帝意旨。没有去得成,便一气而病了,还希望他儿子在他死后把此事的是非曲折明白告诉后世。司马迁性格,很富他父亲遗传。他父亲临终这一番遗嘱,遂立定了他创写《史记》的决心。

谈卒后三年,司马迁承袭父职当了太史令。迁的才情,武帝早欣赏,这本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凭借宫廷藏书,恣意翻读了五年,才开始写他的《史记》,那时他已到四十二岁的年龄。上距孔子卒岁,则整整三百七十五个年头了。在《自序》里,他自己这样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说明他的《史记》,承袭了孔子《春秋》,继续着文化传统,古经

典之大义而着笔。

但不幸前后搭到七年的时期，他又遇了飞天横祸。那时一位青年将军李陵，因兵败，投降匈奴了。陵降匈奴，时年三十六。武帝本也很爱李陵才气，但他又要振厉边将气节，兵败降敌，不得不严办。在他愤闷与冲突的心情下，问于司马迁。迁与李陵在内廷同过事，他直口称赞李陵为人，说他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有国士风。今举事一不幸，那些只知全躯保妻子的人，却随在后面说他坏话。他说这是一极可痛心的事。他又说：陵虽败，他的战功已足表扬于天下。他之降，或许想攫得一机会来报答。但他这番话，洗雪了李陵，却得罪了朝臣。既不主张惩罚降将，而且还牵涉到宫廷亲贵，武帝宠将，种种复杂的内幕。于是司马迁终于下了狱，定他诬罔罪。判决了死刑。但武帝存心并不要真置他死地，依照当时新法令，纳钱五十万，便可减死一等。五十万个五铢钱，只合黄金五十斤。一辈朝贵，千金万金多的是，五十金算什么呢？哪料司马迁服务宫廷，官为太史，前后将近三十年，家中竟拿不出五十斤黄金来！即有爱惜他的，哪敢无端送他黄金五十斤，招惹自身意外的不测呢？依照司马迁性格，应该痛快自杀了事。但他的《史记》还没有成书，他父亲临终遗嘱，和他毕生抱负，不许他自杀。但哪里来这五十斤黄金？而武帝爱惜他，终于减死一等了。在当时，纳不出五十斤黄金，还可请受腐刑，在他的《自序》里，和他有名的《报任安书》中，对此事曾极其愤懑纡郁的交代了。

减死一等便是受腐刑。在当时，腐刑也不算一会重大事，但迁受不了这委屈。他在《报任安书》中，再四愤慨地说，受腐刑

的算不得是人,这是他自己一腔不平之气在发泄。而武帝心下则不如此想。迁受了腐刑,把他替李陵开说的一番风波平息了,立刻调用他做内廷秘书长,当时官称中书令,而且极其尊宠与信任。在武帝本爱司马迁才情,现在他受了腐刑,不该再在宗庙任职,便立地擢用他在自己近旁,他真也算得是爱才。但在司马迁,觉得此后的生命,完全是为续成《史记》而活着,其他一切则全不在他心下了。

他受腐刑还不到五十岁,大概此后还有十年以上的寿命吧!但他的中书令新职,使他整年随着皇帝到处跑,没得好闲暇。他在《报任安书》里自己说:

迫贱事,卒卒无须臾之间。

又说:

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去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在这样的心情下,他不可能享高寿。他的卒年是无法考定了。大概和武帝卒年差不远,六十左右便死了。他临死,《史记》仍没有完成。全书一百三十篇,字数逾五十万,有十篇拟定了题目,没完全成稿的。

《史记》成为将来中国正史之鼻祖,《史记》的体例,也为历代正史共奉的圭臬。但《史记》体例,乃司马迁一人所特创。本